

脫軌 與 裂衣縫

國民黨軍隊的黨軍體制

中華書局

李翔◎著

1924-1928

深圳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二十一世紀中國研究中心」資助成果

緒論	
一 概念界定與研究時限及意義	002
二 學術史回顧與展望	009
三 研究內容、重難點及創新之處	015
四 基本觀點與擬解決的關鍵問題	018
第一章 古今中外馭軍之道述要	
一 「軍權君控」	022
二 「以政治軍」與「文官領軍」	033
三 「以黨領軍」	043
第二章 俄制東輸：國民黨軍隊黨軍體制的起源（1917—1923）	
一 早期接觸	053
二 指陳要害	057
三 打動蔣介石	063
四 鮑羅廷說服孫中山	065
結語	073
第三章 蘇俄與孫中山對植入黨軍體制的認知分析	
一 蘇俄輸出黨軍體制的真實用意	077

二 孫中山引入黨軍體制之心機	083	第八章 「兩個中央」對峙下的黨軍體制	
結語 以俄為師與以德為師——黨軍體制之變數	092	一 「兩個中央」與「黨在哪裏」溯源	241
第四章 知行的分合：孫廖蔣與黃埔軍校黨軍體制的創設		二 「兩個中央」與「黨在哪裏」	245
一 孫中山黨事與軍事的糾結	097	三 軍在哪裏	251
二 廖黨代表與黨權的離位	108	結語	259
三 蔣介石引入黨軍體制的公心與私念	117	第九章 二屆四中全會前後的黨軍體制	
結語 黨軍體制的「橘」與「枳」	128	一 黃埔同學會與蔣介石的復出及對黨軍體制的影響	267
第五章 一次東征至「三二〇事件」期間的黨軍體制		二 二屆四中全會與黨代表制的廢棄	272
一 體制力量初顯與若干隱患	135	三 軍權卵翼下各為其主的政治工作	278
二 體制的推廣與變數環生	141	結語	282
三 汪精衛推進黨軍體制與文武矛盾的激化	151	第十章 北伐告成與黨軍體制解體	
四 黨軍體制「根本發生問題」	159	一 官兵反日怒潮	289
結語 短中長時段看黨軍體制的決定因素	165	二 總政訓部激進反日與國民政府低調外交	294
第六章 汪精衛與黨軍體制之命運		三 凱歌聲中裁減政工機構	300
一 孫去世前汪對黨軍關係的認知	173	四 政訓部主任聯席會議重建黨軍體制的幻滅	305
二 孫過世前後的文武態勢	177	五 蔣介石對政治工作的反思與應對	312
三 汪精衛等文人的內訌與黨軍體制之痛	184	餘論	319
四 汪蔣摩擦與「三二〇事件」	191		
結語 體制之殤	198		
第七章 「三二〇事件」後蔣介石與黨軍體制的變異（1926.03—1926.08）			
一 蔣介石調整黨軍體制的用意與時機	204		
二 蔣介石大力變動黨軍體制	213		
三 蔣介石得以變易黨軍體制的緣由	227		
結語	234		

緒 論

黨軍體制是國民黨以俄為師，在軍隊建設上推行黨治理念，力圖使軍隊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相互促進的制度體系。它強調「黨在軍上」「主義建軍」「以黨領軍」「以黨治軍」「武力與民眾相結合」等。其主要特點是以黨代表為核心，以政治部為主要實踐單位，輔之以特別黨部，三位一體。

黨軍體制的運行既受制度的約束，也受國民黨的組織發展、軍事將領的迎拒態度、國人的傳統思想、黨內派系紛爭、官兵素質、民眾政策等複雜因素的牽制，還受國共關係變動的影響。要實現以黨領軍，黨須以切合時代要求的主義作指導，黨權應具有高於軍權的內在權威，並要實現武力與國民願望的結合。可惜，「清黨」後，無論是軍隊，抑或是國民黨，都漸漸疏遠了民眾，黨和軍均已褪色。由黨軍發展而來的國民革命軍，烙上了厚重的派系印記。1928年初，國民黨中央會議決定不恢復黨代表制，黨軍體制由此出現了巨大的制度漏洞，國民黨黨化軍隊的歷史使命未能完結。1924—1928年的黨軍體制，特色尤為鮮明，是加深理解國民革命及近代中國軍事制度和政治制度變革經驗與教訓的上佳路徑。

一 概念界定與研究時限及意義

（一）概念闡釋

「黨軍」一詞，較早出現於孫中山1916年的文中：「迨袁賊自斃，

黎大總統依法就職，因令各省黨軍停止進行。」¹此時的「黨軍」，不是特定的軍名，只是孫對某些軍隊聽從黨指揮的寄望和虛指，並無多少特殊的政治含義。1923年12月9日，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第十次記錄》決定：計劃於一年內建立兩個師的「真正黨軍」。²1924年4—9月，孫提及「黨軍」一詞的頻率明顯增多。³在鮑羅廷的勸導下，孫此時建立俄式新型黨軍的念頭大為增強。1924年11月11日，孫北上前令黃埔軍校教導團改稱黨軍，任蔣介石為軍事祕書。⁴此際的「黨軍」稱號，等於把教導團與其他建國軍，不僅從名稱上，更從政治身份上區隔了開來。儘管黃埔軍校教導團的規模和軍事實力還不夠強大，但其政治地位已是獨一無二。從某種意義上講，教導團已經成為黨的「禁衛軍」，成為黨鍛造新軍的「嫡長子」。

1924年12月28日，蔣在黃埔軍校演講中突出「黨軍」的特殊身份。這是蔣對孫「黨軍」含義的再詮釋，其着重闡明「以黨領軍」的原則：「黨軍是完全服從黨的命令，受黨的指揮。比方中央執行委員會命令下來要我們怎麼樣，我們就怎麼樣，這樣才算是黨軍。……如果不能聽從本黨的命令，不能完盡黨軍的責任，……那這種黨軍，完全是失了黨軍的性質，反過來說，就是變成個人的軍隊了。」⁵此時的「黨軍」，已經具備了「制度」的基礎。此後，「黨軍」一詞，頻繁出現在各類會議文件、

1 孫中山：《中華革命黨本部通告》（1916年7月25日），上海《民國日報》1916年7月28日。

2 轉引崔海峰：《國民黨「黨軍體制」的建立與變異》（1924—1928），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4月，第1頁。

3 孫中山曾於4月7日、5月28日、9月8日、9月9日，對滇軍、北伐討賊軍第四軍訓話時，和對古應芬發佈指令時，以及給蔣介石函件時，提及「黨軍」一詞。分別參見：《大元帥閱兵之演講》，《廣州民國日報》1924年4月7日。孫中山：《給顧忠琛的訓令》（1924年5月28日），《大本營公報》第十五號《訓令》。孫中山：《給古應芬的指令》（1924年9月8日），《大本營公報》第廿五號《指令》。孫中山：《覆蔣中正函》（1924年9月9日），《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32頁。

4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頁。

5 蔣介石：《以必死之心操必勝之權》（1924年12月28日在黃埔軍校講），秦孝儀：《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0，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149-150頁。

傳媒報導、宣傳資料以及人們的口耳相傳之中。

正如毛澤東所說，「先有事實，後有概念」。¹ 隨着北伐戰爭的高歌猛進，1927年3月，國內出現「黨軍制度」這一提法：「向來軍人總說不談政治，他們黨軍，卻大不然。……這一種俄國式的組織，實在是黨軍制度的第一利器」。² 針對歷史事實，1930年，文公直把黨代表制、政治部制和特別黨部制悉行納入「黨軍之特殊制度」。³

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體制」包含「制度」。⁴ 為便於概括，1992年，劉健清等主編的《中國國民黨史》一書，闢有「黨軍體制的完善和強化」一目。該目的黨軍體制，包括黨代表制、政治部制和特別黨部制。⁵ 此後，黨軍體制這一出現很晚的專有名詞，被內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採用。⁶ 海外學界，洪陸訓使用「政工制度」「政工的體制」泛指黨代表制、政治部制和特別黨部制。⁷ 本文的黨軍體制，借鑒以上成果，探討對象涉及黨代表制、政治部制和特別黨部制。

概而言之，黨軍體制是孫中山在總結革命實踐的過程中，認識到依靠會黨和軍閥不能完成國民革命任務的背景下，藉助蘇共和中共的幫助，按照蘇聯以黨領軍模式，以意識形態為黏合劑而意圖確立的新型軍事制度體系。

黨軍體制集中體現了特定歷史背景下，國民黨對國民革命的探索與嘗試。這一體制的原則是黨領軍，政治軍事平衡發展。它強調黨在

軍上、以黨領軍、以黨治軍，黨的組織凝聚力與至上權威是體制推行的關鍵保障。黨代表制、政治部制、特別黨部制，構成這一體制的主要內容。意識形態控制體系，是這一體制發揮功能的重要推手。意識形態控制體系由相應的組織機構、相關制度和特定儀式組成，是一個相當完備的控制系統。軍民相洽、軍民結合是這一體制發揮威力的主要憑依，孫中山為此有言：「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成為國民之武力。」¹

黨軍體制是國民黨黨治理念在軍隊建設中的制度體現。它既是制度體系，背後更隱藏着無盡的人事變動與權力糾葛。每一條規章律令，背後都浸透着複雜的人事關係。基於此，本文的研究思路立足於黨軍體制的概念範疇，沿着制度體系、意識形態、人事紛爭等幾條線索，分析黨軍體制的歷史及其後世影響。黨軍體制既是孫中山等革命先驅政治及軍事思想演進的結果，也反映了中國社會政治革命、軍事鬥爭、制度與思想文化變遷、國共關係的演變等歷史特徵。

（二）黨軍體制與政治工作的區別

無論是出現的時間先後、內容指向、還是國別，黨軍體制與軍隊政治工作都有着重大的區別。

軍隊實施政治工作，是古今中外的慣例。從軍隊產生的那一天起，政治工作也隨之而興。儘管名稱、內容和實施方式不盡相同，但目的都在培養軍人對本方政治文化、社會價值、權威標準的認同與情感。政治工作是個籠統概念，其內涵與外延隨着時代、政治環境等的不同而改變。但激勵士氣的精神教育，爭取民心的鼓動工作，一直是其中的幾

1 《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頁。

2 冷觀：《南行視察記》，《大公報》1927年3月8日。

3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年版，第80頁。

4 「體制指國家、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等的組織制度，而制度則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動準則。」見中國社科院語言所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343、1757頁。

5 劉健清等：《中國國民黨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266頁。

6 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王奇生：《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1924—1927）》，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徐勇：《近代中國軍政關係與「軍閥」話語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版。

7 洪陸訓：《武裝力量與社會》，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頁。

1 孫中山：《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96-297頁。

項主要內容。

而黨軍體制，則是人類進入近代社會，政黨出現以後，誕生的新型軍事政治制度。其發端於十月革命前後，蘇俄、蘇共和紅軍是全球黨軍體制的首創國家、首創者和最早的踐行者。其特點和制度規劃是，軍隊要服從政黨的絕對領導。

相比於政治工作，黨軍體制既包括事務性的政治教育，更是若干國家若干時段重要的軍政制度。從現代化的角度而言，黨軍體制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是某些國家進入現代社會後的軍政制度，具有鮮明的時代性。

（三）研究時限

黨軍體制的特點是以黨代表制為核心，以政治部制為主要依託，以特別黨部制為輔助。其宗旨是，軍隊服從政黨的絕對領導，軍黨、軍政、軍民相互結合。

1924年，國民黨創建黃埔軍校，以校建軍。這支軍隊引入黨代表制、政治部制及特別黨部制，軍事與政治工作並重，黨軍體制由此發軔。黨軍體制推廣之初，不得不照顧各軍利益而加以遷就與變通，以致體制的一體化難以形成。1926年的中山艦事件，是對黨代表制的重大打擊，黨軍體制遭遇重創。隨着北伐的快速推進，總司令部日益凌駕於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上。1928年2月，國民黨召開二屆四中全會，全會軍事提案審查委員會商定「不恢復黨代表制」。¹原本作為貫徹黨在軍中意志的黨代表制，竟然在黨的中央全會上明文廢止。黨代表制，不折不扣地成了國民黨的「棄兒」。黨軍體制的內核和保障由此缺失。1928年7

月的政工聯席會議，有代表提議恢復黨代表制，卻無果而終；¹12月，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軍政時期結束，政治部被大幅裁撤。師以下各級不再設立政工機構，政工部門在部隊中的地位一再降低，直至成為軍事將領的附庸：「師政治訓練處主任對於同部隊之師長接受其指導，商榷關於公文往來，應用呈文或報告程式。」²儘管軍中還留有特別黨部，但無論是制度上，還是組織機構上，國民黨和軍隊政治工作逐漸分離，黨軍體制退變為軍黨體制。1928年5月，陳公博對國民黨政權的黨軍關係大發感慨：「『黨軍』兩個字幾為過去的名詞，我只見『以軍分黨』，我再看不見『以黨治軍』。這種現象不特危害國民黨的生存，並且足以危害整個革命的生存。」³

針對以上歷史現象，本文的時間跨度，大致上起1924年黨軍建立，下至1928年「軍政」時期結束、黨代表制被廢止。少數內容，時間上下限做了適當的延伸。這一時段的黨軍體制，機構相對比較完備，條例較為成熟，組織特色鮮明，是理解近代中國軍政制度變革經驗與教訓的重要突破口。

（四）研究意義

軍隊是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根基，是其賴以生存的核心要素。軍隊的發展面貌，深刻反映着國民黨政權的歷史。「事實上，他只有政治和軍事的組織機構，而缺乏社會基礎，後者在國民黨政權的政治議程中，列於

1 國軍政工史稿編纂委員會：《國軍政工史稿》，台北「國防部總政治部」1960年版，第433-434頁。

2 《中華民國法規大全—軍政》（上），第3冊，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357頁。

3 陳公博：《今後的國民黨》（1928年5月7日），載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頁。

1 李新總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五卷1928—1930》，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936頁。

最後一項。」¹

政黨的凝聚力和黨權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決定着黨軍體制的起伏命運，並影響軍隊及政權的穩定與存續。加強黨軍體制引入與變異的研究，有助於理清 1924—1928 年國民黨軍隊黨軍體制的演變軌跡及其因由，深化對國民黨及其軍隊整體面貌的認知。

對比 1924—1928 年蔣介石對黨軍體制的不同態度，剖析其建軍思想的變動，有助於對蔣的深入解析，進一步還原其歷史面貌。此外，黨軍體制的引入與變異，很大程度上導因於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將領的迎拒。加強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有助於對軍事將領群體的深入解析。國共關係的變動，對黨軍體制的影響同樣不容小覷。加強黨軍體制引入與變異的研究，有助於從新的視角審視國共關係的演變。

黨軍體制的運行取決於諸多因素。透過黨軍體制的引入與變異，有助於細緻觀察國民黨建軍原則、宗旨、目標、方針等的變動軌跡及其緣由；以黨軍體制為視點，有利於從另一個視角考究領悟國民黨政權的軍黨關係、軍軍關係、軍政關係和軍民關係之間的變動及其根由。

在對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各種要素中，有一種尤為重要，那就是信仰的因素。² 國民黨引入蘇俄紅軍以黨領軍的黨軍體制，既是為革命尋求新的推手，還有憑藉武力為國家樹立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考慮。意識形態的植入及功效，是黨軍體制的又一重要內容。探究黨軍體制的引入與變異，有助於闡明三民主義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傳佈及其效果，多面論析國民黨政權建立、發展及至敗亡的多種歷史因由。

如何管理軍隊？如何控馭軍人？是古今中外的統治者念念不忘的頭等大事。古代中國和平時期的「軍權君控」、近現代英美等國的「以

政治軍」、蘇俄的「以黨領軍」，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三種極具代表性的「以文制武」的馭軍模式。鴉片戰爭以來，面對西方的先進軍事裝備和軍政制度，古老中國被動地、艱難地迎接着挑戰。20 世紀初葉的中國，內外危機異常深重，戰亂不止，軍權干國，甚至軍權獨大。如何由亂到治？在兵為將有、軍閥割據的狂瀾中，中國軍事的現代化之路（包括編練、裝備、思想控馭等）特別坎坷。在這條道路上，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為治理黨與軍分離的痼疾，決定：改組國民黨，強化黨權；以黨建校，以校建軍；引入蘇俄紅軍的黨軍體制，由黨控軍。黨軍體制與中國歷史上的各種兵制迥然有異。該體制賦予中國傳統政治「以文制武」觀念以新的涵義，以使其適應新的歷史時期和時代使命。細密解析 1924—1928 年的黨軍體制，將其放置在歷史發展的長時段中加以點評，目的是動態地、深入地了解這一新型馭軍模式，在中國軍事現代化曲折征程中的經驗與教訓。

近現代的軍事變革與今天或以後的軍事變革及發展，在需要解決的問題與規律方面有着部分相似性。研究 1924—1928 年國民黨軍隊黨軍體制的引入與變異，有助於多層面地認識國民黨黨軍體制變革的得失與成敗，發掘國民黨軍隊興亡的經驗與教訓，為人民解放軍未來的建設發展提供警示和啟迪。歷史證明，軍隊黨化是克服兵為將有的利器。維護以黨治軍的體制，保證軍隊聽從中國共產黨的指揮，對新時期的黨建提出了更高要求，對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也有一定的啟示。

二 學術史回顧與展望

（一）國內外研究的現狀和趨勢

自 1920 年代至今，國內外學界與軍界研究人員對國民黨軍隊黨軍體

1 [美] 易勞逸著，王建朗等譯：《蔣介石與蔣經國（1937—1949）》，中國青年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 頁。

2 [法] 勒龐著，佟德志等譯：《革命心理學》，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導論部分第 3 頁。

制的研究，概括起來，大致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

一是對黨軍關係的研究。著作方面：1928年的《黨軍》文集，反映出當時不少黨員依舊對「以黨領軍」寄予厚望。¹1930年代的《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²、1980年代以來的《軍紳政權》³《劍橋中華民國史》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革命軍》⁵等，相關章節均分析了大革命時期的軍黨關係及其變異因由。但這些作品敘述比較籠統，論證有待深入。台灣學者洪陸訓的《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⁶、高民政的《中國軍事政治學理論：共產黨人的軍政關係思想》⁷，或運用、或介紹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宏觀分析了中國近現代的軍黨關係，對比探討了中西方多種領軍模式，對理解國民黨軍隊的黨軍體制有一定的理論價值。論文方面：自1990年至今，呂芳上⁸、王奇生⁹、江沛¹⁰、徐勇¹¹、郭太風¹²、楊利文¹³、孫桂珍¹⁴、李納¹⁵、崔海峰¹⁶、盧毅¹⁷等認為，以黨領軍的建軍目標，在「清黨」前後變異為以軍控黨。

- 1 上海婦女慰勞北伐前敵兵士會編輯部：《黨軍》，上海中華書局1928年5月出版。
- 2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海太平洋書局1930年版。
- 3 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三聯書店1980年版。
- 4 [美]費正清著、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
- 5 張光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革命軍》，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 6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 7 高民政等：《中國軍事政治學理論：共產黨人的軍政關係思想》，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版。
- 8 呂芳上：《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1920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為例的討論》，載《1920年代的中國》，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印，2002年版，第137-198頁。
- 9 王奇生：《武主文從背景下的多重變奏：戰時國民黨軍隊的政工與黨務》，《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4期。
- 10 江沛：《中國國民黨早期軍隊政工制度的演變：1924—1928》，《安徽史學》2008年第4期。
- 11 徐勇：《南方黨人的「武力」認識及其建軍模式類型研究》，《黃埔軍校研究》第1輯，2006年7月。徐勇：《20世紀中國政黨領軍模式的創立發展》，《歷史教學》2005年第7期。
- 12 郭太風：《以黨治軍與以軍治黨的不同路徑——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兩黨處理黨與軍隊關係述評》，《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
- 13 楊利文：《北伐前後國民革命軍的黨代表制》，《民國檔案》2007年第1期。
- 14 孫桂珍：《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研究》，南開大學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
- 15 李納：《國民黨黨軍機制與變異及影響》，東華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
- 16 崔海峰：《國民黨「黨軍體制」的建立與變異》，吉林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
- 17 盧毅：《試論蔣介石的軍隊政工思想（1923—1949）》，《軍事歷史研究》2010年第1期。

軍黨關係的演替同樣引起一些國外學者的研究興趣。日本學者川島弘三《中國黨軍關係之研究》（東京慶應通信株式會社昭和63年版），對比研究國共的黨軍關係及政工制度，有助於理解「以黨領軍」模式的確立、發展與變革。對於國共的黨軍原則，澳大利亞學者馮兆基的《軍事近代化與中國革命》，既不完全否認其文治性質，但也不完全肯定文治的主導地位。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麥科德《槍桿子的力量：現代中國軍閥主義的興起》（*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都客觀評價了國民黨的黨治與軍事獨裁，得出以黨領軍在一定時段的合理性；認為這一領軍原則能夠發揮軍隊的戰鬥力，又能對軍隊加以有效控制。

二是對軍政、軍民關係的研究。著作方面：1929年的《軍隊中政治工作》一書反省建軍以來的黨軍體制，指出政權腐化給軍隊政治工作帶來了惡劣的後果。¹1935年的《政訓工作之理論與實際》強調政治工作是黨軍民之間的連鎖。要獲得戰爭勝利，政治工作還須面向民眾。²論文方面：余一鳴（台灣學者）運用社會化理論，分析評價不同階段的軍政、軍民關係，角度比較新穎。

三是對幾位領袖人物與黨軍體制關係的研究。著作方面：陳佑慎的《持駁殼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2009年台灣出版），³以國民黨內的代表性左翼人物鄧演達為切入點，闡釋1926—1927年的黨軍體制。論文方面：韓勝朝的研究較具代表性。韓文正面評價黃埔時期蔣介石引入黨軍體制的效能，較早從人物入手分析政

1 鄧文儀：《軍隊中政治工作》，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1929年版。

2 周開慶：《政訓工作之理論與實際》，出版社不詳，1935年版。

3 陳佑慎：《持駁殼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台北時英出版社2009年版。

治工作。¹但因韓文只考察某個特殊時期特殊地域，故對蔣介石給黨軍體制建設帶來的影響缺乏長時段全方位的分析，不利於對蔣的全面解讀。

除了上述三個研究方向，還有一部非常厚實的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通史性的著作值得一提。退台後，蔣介石痛定思痛，重新強化軍隊政工制度。²1960年，台北「國防部總政治部」編撰的上下兩卷本《國軍政工史稿》即與此背景相關。³該書史料豐富，但意識形態痕跡較重，學理性探討稍顯不足。

縱觀幾十年來的國民黨軍隊黨軍體制的研究，可以看到兩個比較明顯的趨勢：

第一，對軍黨關係的探討，一直是學軍兩界的研究熱點。大革命時期的軍黨關係，又是重中之重。這一方面使得現有成果主要集中於特定時段；另一方面使得研究視角主要集中於有限專題；通史性作品又沒有觀照因黨的命運及政治立場而導致的黨軍體制的最終命運。這就為深入研究留下了大量空間，如：1. 蔣介石對黨軍體制態度變化的經過及緣由；2. 政工人員對黨軍體制的反思和抗爭；3. 政工機構與地方政權建設；4. 不同建軍模式對黨軍體制的影響；5. 政權政治立場對黨軍體制的影響等等。

第二，研究方法越來越朝着學科交叉借鑒的方向前進，學術根基日益深厚。但是，現有方法主要集中於社會化理論、文武關係理論，⁴還有

諸多方法有待採用或深化，比如：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革命心理學理論、政治傳播學理論等。總之，無論是研究領域，還是研究方法，都有必要進一步深化對國民黨軍隊黨軍體制的研究，以便全面地認知國民黨軍隊的興衰演替，並考察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的曲折歷程，拓寬國民黨史、民國軍事史、民國國際關係史等的研究範疇。

（二）民國軍事史研究的不足與希望

與民國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文化史等相比較，民國軍事史的研究則相對沉寂與薄弱。¹這主要不是體現在研究論著中量的一面。國內專門的軍事史學刊物有《軍事歷史研究》和《軍事歷史》等，相對於其他專門史而言，發表園地是比較富足與寬闊的，但從學術的影響來衡量，無論是中國人大複印資料的轉載數量，還是期刊影響因子的排位，軍事史學刊物都不能令人滿意。改革開放之初，《軍事歷史研究》上刊發的有較高學術水準的論文比較多見。但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地方高校的迅速發展，軍事院校主辦的刊物學術品質相對在下降。

而且，南京大學版核心刊物一直沒有把軍事學納入C刊體系之中。北京大學版核心刊物，近年也不再把軍事學納入評審體系。學術園地的貧瘠，反映着軍事史學研究的不甚景氣，更說明軍事史學科建設中存在着一些問題。這裏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建立起完整的學科體系，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軍事史研究領域內部各個分支呈現出發展的無序性與不平衡性。以民國軍事史為例，現有研究多集中於戰爭史，而戰爭史又突出詮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史，其詮釋者往往為權威軍事部門或高層黨史

1 韓勝朝：《蔣介石與黃埔建軍》，《南陽師專學報（哲社版）》1992年第3期。

2 有關退台後蔣介石對以黨控軍的重視，可以參閱《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3、24、25三卷若干言談演講。

3 國軍政工史編纂委員會：《國軍政工史稿》，台北「國防部總政治部」1960年版。

4 文武關係理論主要包括：一是文人政府應採取什麼樣的方法對軍隊實施嚴密掌控；二是軍人應該有什麼樣的心態或者說價值觀。參見亨廷頓著，洪陸訓等譯：《軍人與國家：文武關係的理論與政治》，台北時英出版社，2006年版。對前一問題的回答，導致所謂的「文人治軍」（Civilian Control over the Military）理論。這裏的文人指文職領導人。對後一問題的回答導致所謂的「軍事專業主義」（Military Professionalism）理論。從地位上來說，軍事專業主義從屬於文人治軍，因為發展軍事專業主義的目的正是為了文人治軍。因此，這兩套理論是纏繞在一起的。參見高民政等著：《西方軍事政治學評論：美國經典文武關係思想》，時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頁。

1 為了扭轉這種態勢，《史學月刊》2005年第11期特別刊發黃樸民等學者的「中國軍事史研究筆談」，以鼓勵、推動軍事史的研究。